

# 冷戰初期建構華人「自由世界」之窗 ——臺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建制化 (1954-1965) \*

黃國富\*\*

---

投稿日期：2022 年 6 月 13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8 月 9 日。

\* 本文獲中華民國外交部「臺灣獎助金」的支持，也感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的協助，讓作者能在臺灣居留一段時日，蒐集資料與完成此項研究。作者感謝匿名評審的意見與建議，使本文獲益良多。

\*\* 黃國富為獨立研究者，e-mail: kockhoo@gmail.com。

本文引述格式：

黃國富 (2022)。〈冷戰初期建構華人「自由世界」之窗——臺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建制化 (1954-1965)〉，〈新聞學研究〉，153: 1-45。DOI: 10.30386/MCR.202210.0016

## 《摘要》

1950 年代初期蔣介石因應內外的各種壓力，在亞洲地緣政治中順勢接收更多美援，在臺灣強化大學教育的建設和重構宣傳機制。此時國民黨政府在反共與「反攻復國」的口號下，透過招收大量東南亞「僑生」，取得美援的支持，再以這些資源增強對大學體制的控制力，也以此加強中華民國內外的「自由中國」正當性，在各地宣揚自由民主意識。前身為「黨校」的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辦，與其新聞系招收近半的「僑生」，成為當時相當特殊的大學與科系。而臺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以政大新聞系所為重心的開展，除了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的治理需求，當中也考量美國與亞洲非共國家的反共策略與布局，且涉及各國對在地華人的政策回應和治理。但是在「國家」內部的利益分配等因素下，連動影響領導人在各項政策上的推動，也未必能完全壓制些許異議聲音。國民黨政府重整宣傳指揮體系和取得更多美援下，在亞洲試圖建立「自由世界」之窗的形象，在相當程度上形塑冷戰初期臺灣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的基礎。

關鍵詞：自由中國、冷戰、美援、政治大學新聞系、僑生

## 壹、前言

華人在亞洲之間移動及活動，已有相當長遠的歷史。在近現代中國的海外移民中，有一條 Kuhn（2008）所稱的「通道」（corridors），即移民與故鄉一直維持有意義的聯繫管道，相當程度上使得在異鄉的華人覺得從未真正離開過故鄉。在辛亥革命以前，流離海外的華人也未對自己的身分做特別界定（麥留芳，1985，頁 32）。但是從清朝末年到二戰後的國共內戰和冷戰期間，這些華人卻成為各方爭取的對象，而建構中的「中國」民族國家概念，也逐漸影響各地華人的政治認同。這些散居在亞洲不同地域，估計數量達數千萬的華人，持續與「中國」及所處寓居地社群的互動，對彼此社會和政府產生直接或間接的相互影響。

1949 年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由中國大陸撤退遷臺後，風雨飄搖，不論是因應動員戡亂地總動員狀態，或是戒嚴下的軍管措施，在體制上臺灣處於戰爭狀態，並以此為基礎推展各種政策，為即將到來的戰役做準備。因此，戰爭與內政治理兩者的緊密關係，成為臺灣 1950 年代的重要特色（林果顯，2015，頁 241-242）。同時外部環境面對冷戰初期狀態的越趨對峙與緊繃，國民黨政府除了要鞏固在臺灣的政權，也面臨亞洲地緣政治的複雜連動關係。當中有不同力量的交錯牽制，未必為國民黨領導人及深刻影響臺灣的美國政府所能完全掌控，更多地可能是因應情勢變化，試圖作出對政府最有利的決策以維繫政權，以及掌權者自認為的「國家」（the state）利益。

1950 至 1953 年韓戰爆發，讓國民黨政府獲得喘息空間，稍稍穩住陣腳與反省挫敗經驗。1950 年後的十五年間，在臺灣出現以新設或復校的方式，陸續成立了六所公立大學和學院，以及十二所的私立大學和學

院，加上原有的三所改名與改制大學，總校數是急速增加（黃金麟，2017，頁 127）。在這樣的戰時緊繃時刻，國民黨政府具備了什麼樣的內外條件和需求，在臺灣啟動高等教育的發展？前身為「黨校」的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在 1954 年成為首個復辦大學後，首開辦四個研究所中，新聞研究所是其一；隔年再復辦大學部的其中一個科系為新聞系，且招收的學生中，為何近半是各地華裔青年／「僑生」？<sup>1</sup>

在有關臺灣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機制建構的先行研究和討論中，主要把焦點放在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下，以「反攻復國」之名，將傳播媒體與學術視為宣傳武器（林麗雲，2004）；或認為在國際冷戰的政經脈絡下，美國積極地向其他國家輸出美國的傳播學術與意識形態，譬如透過「美援」協助臺灣建構傳播教育機制（程宗明，1999）。因此，有關臺灣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機制建構初期的討論，主要從臺灣威權體制和臺灣附屬於美國的權力視角出發，透過對教學資源、主事者人員背景和課程等部分，剖析機制的建構和批判其早期的威權性格。

然而這些研究可能受限於早年檔案開放不足等因素，未必關照到臺灣所處的亞洲地域。在冷戰初期整體環境快速的變動與其複雜性，其中包括跨地域不同力量的競逐與碰撞，像是「國家」內部權力的可能分歧與「第三勢力」對蔣介石領導權的挑戰，以及外部的美國要阻止紅色力量在東南亞擴散與各地華人社群對大學的渴求等。當中涉及的除美、臺及中共之外，還有和亞洲（特別是華人社群）之間的連動關係，這些因素都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策略及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發展高等教育。譬

---

<sup>1</sup> 「僑生」的稱謂有其歷史脈絡與爭議，在中華民國的血統主義下，早期寓居／僑居中國境外的華裔子弟抵臺念書後，被視為回歸「祖國」的「僑生」。但隨著各地華裔的居住地陸續取得國家獨立，具當地國籍且到臺灣升學的學生已不適用稱為「僑生」，但在錯綜複雜且糾結的歷史因素和現實政治中，迄今臺灣仍使用這樣的稱謂，持續引起一些外國華裔學生的不滿。

如為何在政大新聞系招收眾多「僑生」，這需同時檢視美援與僑務政策的形成和實施，以及國民黨政府的宣傳策略等，或可窺見更複雜的脈絡，其中也牽涉更多面向的權力操作和偶然因素，未必是由上而下單一連貫的決策，但卻連動影響了新聞傳播教育與知識生產機制的建構。

本文試圖理解 1950 年代以後，臺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建制化初始階段，而這裡所指涉的「建制化」，主要是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機構在組織、課程與設施的建立，其中涉及的不僅是在高等教育中建構學術與教學組織及制度，也包含在相當程度上需服膺黨政的宣傳需求，以及臺灣以外各種力量的介入與回應。本文認為冷戰初期的脈絡複雜性，不應過度簡化或一筆帶過，因此嘗試梳理亞洲之間的地緣連動關係，重探冷戰時期反共氛圍下，美國因戰略需要介入的臺灣新聞傳播研究機制建構，以及它對臺灣內部和亞洲跨域地區的可能影響。透過更多面向，本文試圖貼近當時脈絡，更了解臺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機構建構初期的狀態，從中或可窺探此後迄今，對華人地區的傳播與媒體生態之影響。

## 貳、冷戰初期的臺灣內外環境變化

在冷戰的衝突與對抗情勢下，1950 年代以後美國得以直接介入更大範圍的亞洲地緣政治，全面擴張其在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的影響力，將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更廣泛地散播，避免共產力量的擴張。將政權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歷經風雨飄搖，在韓戰爆發後逐漸被扶植成為華人「自由世界」代表，獲得更多美國資源的挹注，以爭取不同地區華人的支持與認同「自由中國」（Free China），有利於蔣介石經營與鞏固在臺灣的政權。

## 一、形塑「自由中國」的驅力

面對共產勢力在亞洲各地的進逼，領導西方民主集團的美國政府，在 1950 年代開始擔心東南亞各國頗有經濟力量的華人社群，會被中共引用為在東南亞擴張勢力的工具。因此，美國希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能成為「自由世界」的象徵，導引東南亞華人以臺灣國民黨政府為其效忠的對象，讓「自由中國」成為各地華人團結反共的集結點（rallying point，趙綺娜，2001，頁 109）。

然而，此時美國政府對蔣介石與國民黨仍不信任，不斷物色與扶植可能取代蔣介石的領導人和力量，當中包括孫立人、吳國楨，以及反共也反蔣的「第三勢力」等替代選擇。同時美國政府也不滿蔣經國主持的國安系統，在臺灣各處逮捕異議人士，進行白色恐怖等活動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相關訊息（林孝庭，2015，頁 98-99）。

因此，1950 年代初期的蔣介石在臺灣的地位仍未穩固，其權力地位可能為其他美方所支持的人選所取代，蔣介石將政治現實考量擺在第一位，把鞏固在臺領導地位與權力基礎，視為其首要之務。1952 年 11 月，向來較同情蔣介石的美國共和黨，在間隔十二年後，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搭配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當選總統及副總統，重奪執政權，此一情勢發展有利於蔣介石向美方爭取支持（Lin, 2016／黃中憲譯，2017）。而亞洲範圍內的朝鮮半島爆發韓戰的三年間，外在緊繃情勢持續變動著，卻讓國民黨政府暫時穩住陣腳，同時警覺美國態度的可能轉換，因此更加提防和打擊可能的競爭對手。

韓戰的停火談判拖了兩年才達成協議，讓美國政府對中共的耐心被

冗長的談判消耗殆盡；加上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已確定蘇聯不會以武力介入韓戰，也無意發動世界大戰，所以美方對中共態度漸趨強硬，將注意力轉向防止共產勢力向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並強調亞洲離島防線的重要性。雖然國民黨政府作為軍事資產的價值似乎有限，但在 1952 年春天之後，其作為政治資產的價值在華府決策者心目中卻大幅提升。對臺灣經濟和軍事潛力樂觀的報告，加上臺灣政治局勢改善，稍稍扭轉了國民黨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美國想培植另一個中國政權吸引「華僑」的支持，以避免中共顛覆東南亞各國。但美國始終無法培養出可利用的「第三勢力」，蔣介石也逐漸成為大陸反共運動的象徵，且在華人反共集團中實力最強，所以美國確定無法擺脫蔣之後，決定將他塑造成中國人的反共領袖，號召海外反共「華僑」，臺灣因此也被賦予政治利用價值（張淑雅，2011）。

此時的蔣介石積極爭取美國的各種支援，重新建立在臺灣的權力基礎。在 1950-1965 年期間，臺灣的外部戰爭狀態仍緊繃，雖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很需要美國，但是在亞洲冷戰場域中的蔣介石，絕非僅扮演著由美國所領導之「自由世界」陣營裡，一個凡事仰仗美國鼻息、以華府馬首是瞻、唯華府是從的馬前卒。相反地，國民黨政府為了臺灣自身的戰略生存與安全利益考量，在中南半島與其他東南亞地區，曾廣泛而積極地介入各地的軍事衝突，設法輸出自身的反共經驗與意識形態，以確保並強化其在國際地位與臺灣內部統治上的合法性及正當性（林孝庭，2015，頁 13）。

Lin（2016／黃中憲譯，2017，頁 266-267）指出，蔣介石在 1950 年代初期所推動的黨務改造，以及其試圖深化國民黨在臺灣社會基礎的種種作為和建設，強化和鞏固了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地位，也加速中華民國體制在臺灣形塑和深化的步伐。但是蔣介石所推動的改革舉措，部分

來自於與海外敵對政治勢力（如「第三勢力」）暗中較勁的心態，甚至可說是受到這些勢力的挑戰而推動。至於美國在冷戰過程思考對中共與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時，展現的是彈性與實利主義的態度，以及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的學習與調適（張淑雅，2011，頁 34），因此美方政策的思考與執行因應情勢變化調整，與蔣介石政權也維持某種程度的矛盾與張力，但在反共大方向下，美臺仍然展開持續的合作關係。

## 二、高教開展的機遇

黃金麟（2017）認為，因為內戰和撤退，中國共產黨在本土的反帝行動與 1952 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內部展開高校院系調整，特別是針對大量的教會學校，推進臺灣的大學系統在 1950 年至 1965 年間快速擴張。但是黃金麟對臺灣高教的分析，主要討論內戰與冷戰下，臺灣、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卻忽略當時更廣泛且複雜的亞洲情勢發展。除了中共在中國大陸內部的高校治理，也涉及中共對外積極行動所引發的效應，譬如招收大量港澳及東南亞華裔青年「回國」就學，使美國、臺灣和東南亞各地殖民政府及新興國家感受到壓力（黃庭康，2017），<sup>2</sup> 必須在亞洲地區建立自由世界的華文高等教育據點，以回應中共的壓力，與其展開在文化與教育場域的競爭。

1951 年 6 月，美方獲得菲律賓總統季里諾（Elpidio Quirino, 1890-1956）首肯，以馬尼拉作為訓練第三勢力的基地，開展各種業務，包括籌備一所華文大學，收容港、澳流亡青年與海外華人，作為將來第三勢

---

<sup>2</sup> 直至 1955 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共對外招收華裔青年到中國大陸就學的動作才趨緩。

力的基本幹部；且籌辦報紙銷售東南亞各地，以海外華人為宣傳對象，抗衡中共吸收華裔青年的文化攻勢。蔣介石知悉美方的政治動作與盤算，且獲知在美方鼓動下，當時已有些第三勢力成員，自香港飛往馬拉，參與各項籌備工作（林孝庭，2015，頁 98；黃庭康，2016，頁 101）。蔣介石對第三勢力猜忌甚深，惟恐其未來成為爭取美國援助和爭取各地華人支持的競爭對手（趙綺娜，1997，頁 89-90）。因此，美方與第三勢力合作籌辦華文大學等動作，對蔣介石形成一定壓力，但也更理解美國對華人地區高等教育的關切。

為爭取華裔青年的認同，1950 年代美國也在香港和東南亞資助知識人士開辦刊物等舉措，積極向東南亞華人地區推廣自由民主觀念，對抗中共日益擴張的力量，其中包括與第三勢力有聯繫的友聯集團。<sup>3</sup> 友聯與自由亞洲協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CFA）、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TAF）有合作關係，從香港行銷書籍、期刊、畫報和雜誌等華文宣傳品至整個東南亞（王梅香，2020，頁 129），逐漸建立對華裔青年世代的影響力。

1954 年友聯內部知識人士提出「東南亞海外青年計畫」（Youth Program for Oversea in Southeast Asia），是針對中共向海外華裔青年召喚「參與祖國的建設」。為減少東南亞華裔青年前往共產中國升學，友聯知識人士提出增加更多高等教育的機會，包括興建新加坡的南洋大學（簡稱南大）及臺灣的東海大學等（王梅香，2020，頁 136）。

雖然美國與第三勢力在菲律賓開辦華文大學的倡議未實現，但美國認為在東南亞應設立華文大學來吸納華裔青年。在左翼力量不斷壯大的

---

<sup>3</sup> 國民黨政府持續關注友聯集團的活動，特別是防範友聯積極在東南亞發行刊物，令國民黨政府擔心第三勢力的擴張（外交部，1957 年 3 月 30 日，檔案編號：A303000000B/0044/818.11/0005）。

馬來亞 (Malaya) 與新加坡，<sup>4</sup> 1953 年當地華人如火如荼地籌備在新加坡創辦南洋大學，國民黨政府也非常關注此事的進展 (外交部，1953 年 1 月 28 日-1956 年 1 月 5 日，檔案編號：020-010505-0005)。但是星馬的英國殖民政府認為，馬來亞逐步邁向國家獨立的過程中，創辦一所華文大學不利於培養當地華人的馬來亞本土意識。然而美國國務院從區域穩定的立場，在 1954 年 4 月向英國殖民地部表達支持南大的創辦，其基本理由包括應灌輸西方的「民主原則和思想」及探索反共的潛能等，希望英政府檢討對南大的反對政策。由於華府的介入，使得英殖民政府的南大政策出現轉變，作出部分妥協，即允許南大的成立，但仍不承認南大的學位 (利亮時，2012，頁 67-68；楊進發，2008)。當時星馬許多華人雖認同在地新興國家的獨立，但也憂慮國家成立後華人的處境，特別是其文化認同能否獲得存續，南大的成立也可視為族群可能被同化的焦慮展現。<sup>5</sup>

星馬華人各階層出錢出力開辦中文教學為主的南大，讓美國政府更了解東南亞華人大學教育的渴盼。因此也希望臺灣能興辦大學，爭取更多東南亞的華裔青年到臺灣留學和生活，削弱共產意識形態和宣揚自由民主理念。而國民黨政府也看到了這樣的機遇，試圖將美國資源轉為己所用。

---

<sup>4</sup> 十九世紀初期以後，英國人逐漸殖民新加坡 (早期也被稱為星洲或星加坡) 與馬來半島各州，兩地關係緊密，一般將兩地簡稱為「星馬」。1957 年馬來半島 11 個州組成的馬來亞，脫離英國殖民成為獨立的國家。在反共等因素考量下，1963 年馬來亞、新加坡，以及婆羅洲的沙巴 (Sabah) 及砂拉越 (Sarawak) 組成馬來西亞 (Malaysia)，但 1965 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成為獨立的國家。

<sup>5</sup> 南大在 1955 年創立，但一直面對政府的不友善對待。1980 年南大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1981 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大校址設立南洋理工學院；1991 年南洋理工學院與國立教育學院合併，成立南洋理工大學。另外，南大未設新聞相關科系，且學費稍高於獲美援支持後赴臺唸大學的費用。

1953 年 11 月初，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在訪問東南亞結束後抵臺訪問，也參與私立東海大學的動土典禮，<sup>6</sup> 對東南亞情勢有實際觀察的尼克森希望國民黨政府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爭取東南亞華人的支持，蔣介石回應已有計畫隔年開辦華僑學院（沈錡，2000，頁 243）。

尼克森離臺後，1953 年 11 月 20 日首次召開的中美特別委員會上，討論由中華民國教育部擬定的《僑生教育計畫實施草案》，決定了中美合作的「僑生」教育方案（國立教育資料館，1959，頁 56）。1954 年初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制定教育援助方案的基本政策，由行政院長陳誠擔任主席。隔年逐漸將僑教問題移交由中美小組委員會負責，小組成員包括教育部、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亞洲協會、美國新聞處、美國大使館及美國安全分署等組織（國立教育資料館，1957，頁 53）。

在美援的「僑生」教育方案中，受援助的是東南亞地區華人，香港與澳門等地的「僑生」不在資助範圍內，<sup>7</sup> 顯見美國在此計畫中的針對性目標。對東南亞地區不少中下階層的華裔青年來說，在升學費用可獲美援大幅補助下，赴臺深造成為頗具吸引力的選項，使得到臺灣唸大學

---

<sup>6</sup> 國民黨掌權者並非毫無保留地歡迎西方宗教背景的院校，因過往國民黨一直認為西方教會在中國辦學是侵犯中國政府的教育主權，且不滿教會學校未配合政府向學生灌輸對黨國的認同。因此，1950 年代初期美國教會提出在臺灣開辦大學時，國民黨政府的反應是保留和審慎。經冗長的談判，「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同意國民黨政府提出的多項條件，東海大學才獲准創辦（黃庭康，2017，頁 173-174）。

<sup>7</sup> 1951 年僑生共 60 名，但 1954 年在美援開始支援下至 1965 年為止，先後到臺灣念書的僑生總共有 20,078 人，主要來自港澳、星馬、印尼和越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經合會〕，1966a，頁 1-5）。其中臺美對於僑教計畫所包含的地區有歧見，國民黨政府認為應納入香港與澳門，因其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樞紐，至計畫中期才獲美方諒解（張其昀，1958，頁 1-2）。

的「僑生」逐年增加。

到了 1954 年底，臺灣整體經濟、財政與貨幣情勢都有明顯改善，島內大宗物資價格大致穩定，政府預算與稅收約略打平，島上大部分地區的物資出產量，來到了 1949 年政府遷臺以來的新高（Lin, 2016／黃中憲譯，2017，頁 278）。在政治上，蔣介石所領導的政府也穩住陣腳，且透過專制力量壓制反對聲音。對外經韓戰後，也獲得美國的支持，暫時稍減中共的威脅，得以開展各種在臺灣的建設。

從上述討論可見，1950 年代初期美國除輸出和產製各種文化產品，嘗試影響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也希望建立華文大學吸收華裔青年，避免他們到中國大陸留學和受到中共影響。1954 年後蔣介石順勢接收更多美援，在臺灣強化大學教育，且開始大量招收東南亞「僑生」。因此，此時臺灣大學院校的大量擴張，非蔣介石政權或美方的單一決策，而是在冷戰內外環境動態變化下的機遇。對於「共匪」可能利用「僑生」身分滲透臺灣，國民黨政府在 1950 年代初期較謹慎審查（黃庭康，2016，頁 92）。隨著情勢的變化，在更大壓力下更積極推動「僑生」政策，但也需承擔被「滲透」的風險。

### 三、「國家」內部權力的競爭與分歧

#### （一）各大學競爭美援資源

國民黨政府在退守臺灣的前幾年，除了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名為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一直苦於經費不足，難以開展高等教育領域。美援從 1952 年開始資助臺灣的教育發展，讓建立大學的計畫露出曙光。

美援的經費配置可分三個類別：一是職業教育；二是「僑生」教

育；三是科學教育。「僑生」教育是自 1954 年開始補助，從新臺幣援款來看，占的比例最高，為其中的四成（安後暉，2010，頁 97-102）。自 1962 年後美援教育計畫被認為應逐漸停止，其中包括僑教計畫，經政府與美方交涉，美援僅允許 1963-1965 年度支持舊僑生旅費及生活費款項，對 1963 年以後抵臺的新僑生不再補助。美援下共 12 年的「僑生」教育計畫中，教育部與僑委會共接受援款新臺幣三億一千餘萬元及美金一百餘萬元，援款在 1958 年時最高，其後逐漸下降。援款的主要用途是興建學校建築、添置設備和支付「僑生」旅費及生活費等（行政院經合會，1966a，頁 16-18）。

以每一學生為計算單位，僑教經費的補助達新臺幣兩萬元（張其昀，1958，頁 2）。<sup>8</sup> 而「僑生」教育經費的增加，讓教育部門掌握更大的權力，且使大學增加了發展的可能空間，特別是硬體建設和設備部分。美援的分配與運用視各校「僑生」名額來分配，因此原本因條件匱乏不特別熱衷容納海外青年學生的臺灣各大學。在美援降臨後，可透過容納「僑生」獲取更多補助來發展學校，也促使他們在招收「僑生」事務上作出調整。

美援期間，依規定臺灣的各大學需設「僑生」名額 1,800-2,000 名不等，其中 80% 集中在臺大、政大、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大）和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四所大學（何介富，1975）。此時期各大學招收「僑生」名額不占本地生名額，且獲得美援補助，因此各校競相爭取「僑生」的分配名額。而這四所大學也成為此時期的最大獲益者，且「僑生」的集中，有助於監控可能的「滲透」。其中，在臺復辦的政大，大部分建築費是由僑教經費支付（國立教育資料館，1959，頁

---

<sup>8</sup> 此補助金額頗高，以 1962 年舉行落成典禮的政大新聞館為例作對照，新聞館建地五百餘坪，三層樓，建造費用為新臺幣 176 萬元（林元輝編，1995，頁 41）。

61)，可以說主要是透過美援建立起硬體設施，也成為國民黨政府培植人才的重心。

國民黨政府獲得更多美援支持後，結合運用「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意識建立政權的正當性，召喚中國民族主義，讓「反攻復國」的口號對島內外更有號召力和說服力。在不影響臺灣內部學生名額下，各大學也競相爭取經費發展學校，讓在臺灣的學生也能享有大學擴張下的好處，減少社會的阻力和反彈。

## （二）黨政系統內部競爭與合作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東南亞有相當數量的「華僑」受到感召，回到中國大陸建設「新中國」，且中共政權更積極招攬青年入讀中國大陸的高校，使「華僑」左傾的氛圍更趨濃厚，也讓非共的部分東南亞國家及殖民政府倍感憂慮，深怕影響在地社會的政治逐漸被「赤化」。

面對數量龐大的「華僑」在政治態度上的可能轉變，以及越來越多華裔青年到「匪區」就讀，讓國民黨政府感受極大壓力。1950 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在「僑生」政策上缺乏共識，也限制了「回國」學生的數量。當時最積極爭取「僑生」的是僑委會，一方面是因為「僑生」的「業績」直接影響它在國家行政系統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僑委會直接面對海外華人社群的壓力，必須回應華僑的訴求。然而其他部門處理「僑生」的手法往往與僑委會方針背道而馳（黃庭康，2016，頁 89）。此時國民黨政府委由鄭彥棻身兼僑委會主委與國民黨第三組主任，試圖更有效地整合政府與國民黨的資源及權力，爭取各地「華僑」社群的支持，特別是在地緣政治下被視為重點地區的東南亞。

一直強調僑教是僑務基礎，「無僑教即無僑務」的僑委會，在美援

的支援下，得以要求在臺灣的教育體系中容納更多「僑生」，回應各地華僑的需求和建立反共的力量，抗衡中共的競爭。譬如 1955 年 9 月僑委會臺北召開「華僑文教會議」，召集各地僑校、僑報和文教團體代表參加，希望透過推進文教方面進行反共工作；在「發展華僑社會教育方案」中，對發展僑報有數項具體建議，其中要求在政大設立新聞學專修班，招收有志從事新聞事業的華僑青年，經一年或二年的訓練和實習後，回僑居地擔任新聞工作（鄭彥棻，1955，頁 84-85）。在戰爭的狀態與氛圍下，協助進行更有效的宣傳工作。

但是面對實際需要和外在壓力，僑委會的層級未必有能力應要求在政大開辦此短期訓練班，而是改在有社會教育系（以下簡稱社教系）的師大開辦，當中可能是妥協和協商的結果，讓此類訓練班可以快速成立運作。師大剛由省立臺灣師範學院改制成為大學，仍需經費與資源建校，且其獨立性原本不及臺大，教育部更容易控管其直屬教育單位，和僑委會合作推動計畫時阻力較少。

對另一涉及「僑生」教育的教育部來說，美援亦刺激教育部積極執行「僑生」計畫，從 1954 年至 1965 年有超過新臺幣兩億元的「僑生」款項透過教育部執行（行政院經合會，1966a，頁 18），該部因而掌握了更多資源及權力。為了壯大「僑生」計畫，主管教育當局千方百計增加「僑生」人數，教育部也在擴大自身權力，削弱大學的自主權，譬如臺大（黃庭康，2016）。

美援帶來的經費亦迫使大專院校在「僑生」問題上妥協，過往學校並不特別熱衷招收海外青年學生，是因錄取「僑生」並不會帶來更多的資源，反而會使原來已捉襟見肘的設備及經費更形不足。然而美援降臨後，容納「僑生」的學校可以獲得更多補助（黃庭康，2016），使各大學得以更全面開展各學系與研究，但也更受制於政府的管控，自主性被

削弱。而有黨校背景的政大，在臺從無到有的復校過程，各種資源皆需仰賴黨政系統，使其在校務的自主性上受到更大限制。上述內戰與冷戰初期的內外複雜狀態，不應僅視為單純的背景，它也動態地影響著臺灣新聞傳播教育與知識生產的建制化。

## 參、黨政治理的宣傳需求與政大的復校

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日本將統治逾半世紀的臺灣交還給中國。但隨後國民黨政府處於與中共內戰的狀態，直到 1949 年底的期間，國民黨政府對於臺灣的統治，基本處於過渡性質。而 1947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上萬人死亡，使得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之間產生相當大的隔閡。國民黨政府撤退遷臺後開始在臺灣的統治，正像任何新興國家一樣，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包含了國家機器建構與國族建構的過程（王振寰、錢永祥，1995，頁 32-35）。

同時，宣傳工作也被認為是國民黨政府丟失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得國共內戰期間輿論幾乎倒向共產黨，政府作為難以被人民理解，甚至重要友邦如美國也同情中共。因此如何在臺灣徹底扭轉此種劣勢，成為相關部門的當務之急。在這個脈絡下，國民黨重視重建宣傳指揮體系，整頓媒體經營，改進宣傳內容（林果顯，2014）。1950 年蔣介石決心推動國民黨的內部改造，在臺灣開啟國家機器建構與國族建構的「計畫」，其中包括對內外更積極的宣傳工作。

1951 年國民黨宣傳業務小組成立，蔣介石仍將宣傳實務委由親信處理。1954 年 9 月 3 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臨時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宣傳指導小組，「研商關於宣傳決策之指導，並為總裁所主持之宣傳會談作準備工作」。中央宣傳指導小組是蔣介石的宣傳幕僚，協助指導

宣傳決策，成員網羅黨政軍宣傳機構及黨營媒體負責人共 28 人，包括陶希聖、曾虛白和謝然之（任育德，2009，頁 229-232）。

除了強化實務的宣傳工作，國民黨政府在 1950 年代初期已有意成立傳播教育與學術機構。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同年 9 月國民黨政府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在臺北成立國防部政工幹部學校（後改為政治作戰學校），這是透過美國防衛援助（Defense Support）贈與的款項結構性地扶助。在當時美援計畫下，大眾傳播是一種反共的科技，政工幹校成立新聞組，由留美明尼蘇達大學與密蘇里大學的謝然之任新聞系主任，學校的教育即以反共文宣的訓練為主；在心戰方面，尤以美國的教材為重要參考（程宗明，1999，頁 396-401）。這也是臺灣最早的大眾傳播教育機構，除了國民黨政府對於宣傳的需求，也與美國在亞洲的整體戰略密切相關。特別是亟欲向各地華人宣揚民主自由意識，以有效遏制共產勢力的擴散，但政工幹校在軍事框架下的新聞教育，未必足以擔負此項頗為龐大的任務。

1952 年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曾通過《本黨當前宣傳指導（草案）》，即指出「開設學系或新聞專修科以造就新聞人才」（林麗雲，2004，頁 77）。1953 年主要由實務界人士組成的「臺北市編輯人協會」推動「新聞教育運動」，曾向臺大提出具體建議設立新聞系，敦促政府同意由臺大成立新聞系，以培養本地的新聞人才。該會也在媒體上製造輿論，希望能成事，但最終未獲國民黨政府接納其建議（臺北市編輯人協會第四屆理監事會，1956，頁 156-157）。

國民黨政府本有意在大學開設新聞科系培養新聞人才，但為何未接納實務界人士的建議，部分可能和當時臺大仍具相當自主性，未必為教育部所能掌控有關（林麗雲，2004；黃庭康，2016）。對於重視和抓緊宣傳事務的國民黨政府來說，不願將關乎培養宣傳人才的機制設置在臺

大，但也感受到實務界對培養新聞人才和知識生產的積極態度。<sup>9</sup>

面對內外不穩定情勢，國民黨政府也更急迫建立一套道德論述，以穩定統治的基礎。此論述隱含特定的世界觀與邏輯，即邪惡的共產主義威脅與破壞自由世界。而國民黨政府代表自由與正義，繼承中華文化的道統，正與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國家合作，對抗邪惡的勢力，致力於反共戰爭，因此必須更加強化宣傳，說服國內外人士相信其道德論述。在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下，以黨政力量介入與動員傳播媒體、教育與學術等重要論述工具，特別是成立新聞傳播教育與學術機構（林麗雲，2004，頁 70-77）。因此除角色較為受限的政工幹校，需要有其他教育機構來擔負此任務。1953 年 7 月韓戰停歇，但亞洲其他地區的情勢仍緊繃，美國強化文化冷戰的攻勢，也投下更多資源加強臺灣反共人員的宣傳能力和訓練，使得國民黨政府更具條件開展新聞與傳播教育及知識生產。

國民黨政府遷臺後，曾有原則上在中國大陸的公立大學，在臺一律不考慮復校的決議（見 <http://archive.rdw.lib.nccu.edu.tw/history/>）。但是在島內外的情勢變化與壓力下，加上取得不同美援項目的支持，國民黨政府值此時機加速建設高校，強化國家建設上最需要的教育與工業等領域，也在政權需要各種人才鞏固權力的思考下，快速推動政大在臺復校。因此，政大作為國民黨政府在臺復校的第一所正規大學並非偶然，當中有其政治考量，且深深影響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黃金麟，2017，頁 128）。不過這個時機的出現，背後還是因為內外各種條件的促成。

---

<sup>9</sup> 1954 年政大新聞研究所成立前，臺灣存在著「臺北市編輯人協會」1951 年創辦的《報學》，且形成了小型民間傳播學術生產場域，部分過去在中國大陸曾從事新聞教育與實務工作者，在此刊物上發表看法。初期的主流思想是新聞自由理論，相當程度上挑戰國民黨的言論控制，當時還能夠為政府所容忍，以展示其「民主櫥窗」形象，但 1954 年底國民黨政府獲得較穩定的外力支援後，改採較強硬態度，縮小容忍範圍（林麗雲，2004，頁 88-91）。

蔣介石在 1954 年 5 月 20 日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後改組內閣，而原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張其昀出任教育部長。1954 年 6 月 9 日張其昀呈函行政院復辦政大；7 月 3 日蔣介石核派張其昀、蔣經國、陶希聖等十人為政大復校籌備委員，決定先設研究部（見 <http://archive.rdw.lib.nccu.edu.tw/1952to1971/>）；12 月 2 日，政大研究部正式開課，是國民黨政府在臺復校的第一所正規大學，此時幾乎沒有什麼硬體建設，其中新聞研究所是借教育部疏散房屋開課（曾虛白，1990，頁 727）。

政大的復校從正式提請復辦到研究部開課，僅費時半年即執行完成，效率極高。1955 年 4 月蔣介石直接任命原代理校長陳大齊，正式成為政大復校後首任校長。政大在臺灣的快速復校，也彰顯了最高權力者的意志和其政治需求的考量。

1954 年政大復辦後，首先設立行政、公民教育、國際關係與新聞等四個研究所（前三者隔年改為政治、教育與外交研究所），皆為人文社會學科。與原有的臺大，以及改制的成大和師大有所區隔，主要從黨政領導階層角度出發，培養國家所需相關領域的人才，也可見主事者亟需處理的鞏固權力及治理議題。即從對內的行政與教育著手，強化與穩定內部治理；對外加強國際關係和連結，以和中共競爭在國際上的地位，再以新聞傳播進行國內外的宣傳，正當化國民黨政府的治理。

1955 年政大開啟的大學部，則新設新聞、教育、政治、外交及邊政學系，這些科系的設置，明顯也皆與政府的治理需求、維繫與教化人民，以及文化宣傳有關。此時的國民黨政府重整旗鼓，需儲備更多管理「國家」的人力，且也需掌控教育和意識型態，強化「國家」內外的治理，展現其反攻大陸的決心與企圖心；提升在「自由世界」的角色，以鼓舞人民士氣和重建中華民國在海外華人社會及國際的形象。此後，政大陸續開設商貿與管理等科系，也與黨政的施政需求和方向密切相關，

持續執行建構國家機器與國族的「計畫」。

從 1950 年代美援經費投入臺灣高教領域來看，華府投入大量資源支持臺大、成大與師大的發展，美國支持的項目大部分是自然科學及具實用性的學科，譬如透過「科學教育計畫」、「醫學教育計畫」、「工程科學計畫」及「農業科學計畫」項目資助臺大；支持師大的最主要項目是「工業教育計畫」，以培養技職院校的師資，相對下政大獲得的金額較少，但並不表示美國忽視人文社會學科（黃庭康，2017，頁 170-171）。

作為中央政治學校（前身為中央黨務學校）和中央幹部學校的合併產物，政大一直是國民黨政府的人力培育搖籃。政大是政府高級官員的培養場所，美國很清楚它的利益必須透過臺灣的菁英來落實，因此華盛頓透過不同管道和多樣方式對政大的外交、大眾傳播及工商管理碩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簡稱 MBA）計畫給予合作與支持。政大成為美國在亞洲反共策略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美國在扶植有助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之同時，並沒有忽略有關政治、管理以及影響意識形態的人文社會學科（黃金麟，2017），這也是文化冷戰下美國重視治理與意識控制的實踐。

除了美援，美國還透過傅爾布萊特法案（*Fulbright Act*）和史墨法案（*Smith-Mundt Act*）的經費在臺灣進行文化外交活動。1956 年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官員認為，當時以史墨法案經費到臺灣授課的三位美國教授，有很好的機會影響臺灣的大學師生，特別是他們在政大客座教授的職位，更具有影響力，因為政大是訓練臺灣外交和新聞傳播人才的重鎮（趙綺娜，2001，頁 102-103）。

1955 年政大首屆大學部招生名額：本地生 100 名、「僑生」160 名，可能是為了討好美國，以爭取美國在日後提供更多援款（黃庭康，2016，頁 107）。不過，政大在 1955 年入學的實際「僑生」人數為 105

名、1956 年為 95 名，和招生目標有些落差，可見政大復校初期在招收「僑生」部分未必非常順利（外交部，1955 年 4 月 5 日-1957 年 12 月 5 日，檔案編號：020-049910-0062）。

在美援撥付給臺灣各大學的經費中，主要給臺大、政大、師大與成大四所大學。美援結束後，美援會對臺大、師大與成大的美援效果都進行成果檢討報告，當中相當清楚臚列各種經費的運用（行政院經合會，1966b；1966c；1966d），唯獨缺政大的成果檢討報告，是否也可理解為政大的特殊性質和角色之一部分，尚待進一步釐清。

## 肆、新聞傳播研究機制的奠定

1935 年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在政大前身的中央政治學校設立新聞系，校長蔣介石認為「新聞事業與革命建國關係密切，而新聞人才之培養尤為健全的新聞事業之根本」（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61）。除了因應國內各地需要的新聞人才，政大新聞系的另一特色是為培養國際宣傳的人才。在 1942 年的抗戰階段，政大與中央宣傳部合辦新聞學院，並延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主持教學工作，這是政大新聞研究所的前身。因此，政大新聞系在基本使命，以及在教育內容和形式上，與一般學校不盡相同（徐佳士，1982，頁 90-92）。「國家」的存亡與發展是政大新聞系所最重要目標，也是此時期的重要使命，且與國民黨政府密切相關。

1950 年代中期因軍事聯盟的建立，臺灣逐步走出「血洗」與「解放」的陰影，開始在行政領域建立國家直接支配社會的能力，希望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領域培育國家所需人才，國民黨政府清楚要投資且利用高等教育來鞏固政權（黃金麟，2017，頁 150-152）。

但是在 1954 年開辦新聞研究所前夕，爆發首次臺海危機；1958 年再爆發二次臺海危機。在當時臺灣的戰爭狀態下，新聞管制是戰時施政的重要工作，且取得以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之名的正當性，黨政軍宣傳部門也強化更有效的新聞與宣傳機制（林果顯，2015），逐漸加強介入媒體的種種措施。黨政在新聞媒體逐漸建立嚴密的內控機制，無論在言論的守門機制，或是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偵防機制，且透過「政治獵巫」行動，在反共之名下以政治案件掃除異己，不少新聞工作者也涉及政治案件（陳百齡，2019）。因此，1950 年代臺灣的新聞環境可說是籠罩在總動員作戰的氛圍中，此時新聞傳播系所的建立，更有國民黨政府面對戰爭的急迫現實需要，影響了此時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建制化。

在培養新聞傳播人才部分，國民黨政府開始建構其可掌控的機制，透過領導人所信任的宣傳官僚在臺灣建立傳播研究與教育系統。政大新聞研究所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配合國策及培養高級通才」（謝然之，1963；轉引自林麗雲，2004，頁 80），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高級新聞人才，面對此時仍然緊繃的戰爭狀態。

在 1950 年代以蔣介石為首的宣傳體系中，積極關心和介入宣傳事務，而曾虛白是宣傳體系的一員，曾協助蔣介石進行情報蒐集與調查工作（林果顯，2014）。在蔣介石的核心幕僚陶希聖因黨內人事矛盾拒任新聞研究所主任後，<sup>10</sup> 改由當時任中央社社長的曾虛白接下此職務，前

---

<sup>10</sup> 陶希聖本是蔣介石的文膽，是當時黨政宣傳核心機制負責人，政大復校的籌備委員中，陶希聖是其一。但是陶希聖是從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處得知，教育部簽呈總統由陶希聖擔任新聞所所長，而非教育部事前徵詢或告知。陶希聖也不贊同另一個研究所的人事是由立委崔書琴接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經表達未獲回應後拒絕任命（陶晉生，2014），才改由曾虛白接任，其中涉及陶希聖與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的矛盾。

後擔任新聞研究所主任十五年（1954-1969）。曾虛白在 1943 年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副院長，到臺灣時曾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在擔任黨營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時，他曾短暫身兼國民黨第四組主任，以及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等職務，可謂是 1950 年代初期宣傳官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政大新聞系在 1955 年復辦時也由曾虛白兼系主任，但因分身乏術，隔年交由同樣具濃厚黨政背景的《臺灣新生報》社長謝然之接系主任一職（1956-1960），開展政大新聞系所的建制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掌握新聞傳播學術生產主導權的曾虛白，與謝然之皆已在政治與文化場域所累積的資本，使其能穿梭在政治教育與學術之間，且將政治場域的邏輯轉移至教育與學術生產場域，以學術的語言加以詮釋和傳遞（林麗雲，2004；楊秀菁，2012，頁 20-21）。

新聞研究所在建立學術研究生產基礎過程中，曾在戰時擔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副院長的曾虛白，善用其人脈與美國的各種資源。譬如透過美國新聞處動用美方專設援外的「傅爾布萊特基金」資助，從 1955 年起邀請美國和日本學者到政大擔任客座教授，至 1970 年前後陸續有十位學者在政大講學開課（林元輝，1995；曾虛白，1990，頁 725-729）。1962 年曾虛白獲美國亞洲基金會贊助，開始進行《中國新聞史》一書的撰寫計畫，建構以「中國」為想像的新聞史，也確立中華民國的正當性（曾虛白，1990，頁 738-743）。政大新聞系部分任職實務界的兼任師資，此時期也在美援資助下赴美考察與訪問（程宗明，1999，頁 403-404）。上述有關新聞研究與教育建制化的資源投入，僅是美援的一小部分。整體來看，從 1951 年開始，透過共同安全法案、史墨法案和傅爾布萊特教育交換法案的支持，臺灣陸續派出近萬名學者、專家、官員和學生等赴美考察、訪問和深造，在為期近二十年的學

術交流中，建構不少社會菁英的親美立場（黃金麟，2017，頁 140）。

政大新聞研究所初期聘請的美國客座教授，在臺主要開設課程為公共關係、大眾傳播、民意學。而在二次大戰至冷戰時期，美國政府需要對外國敵人與本國軍民進行宣傳，使宣傳與民意研究成為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Simpson, 1994, pp. 79-93；轉引自林麗雲，2004，頁 44-45），有助於美國建構整體的心戰策略。

政大新聞研究所直接引進美國主流的傳播研究，以及研究工作的世界觀和認識論，建構臺灣新聞傳播的知識生產體系，且這也符合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現實政治與戰略需求。這些美國學者除帶來美式主流新聞傳播研究的各自專長，部分學者的著作在臺灣被翻譯發行，且他們也協助臺灣學生赴美名校留學，有利於培養受美國訓練的新聞傳播研究新血，後續學成返國加入研究與教學行列。

美援計畫也資助聘請日本的學者，譬如曾擔任日本新聞學會會長的東京大學教授小野秀雄（Hideo Ono），在 1959 年 3 月至 5 月間到政大新聞系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日本新聞史」、「新聞學研究」等課；1963 年小野秀雄首獲頒政大名譽教授（林元輝，1995，頁 5）。透過持續的學術交流，顯示美日中反共同盟的合作與連結。

政大新聞研究所復辦後，擔任所主任的曾虛白運用其過去經驗和可取得的美國資源，積極在臺灣構建新聞傳播研究機構，配合執行國家的施政大方向。而冷戰時期的美國，也有計畫地推銷其反共的意識形態，以防止「赤禍」擴張到「自由地區」（Simpson, 1994, pp. 79-93；轉引自林麗雲，2004，頁 87）。透過美日學者的協助，強化了軟體建設，政大的新聞傳播知識生產機制逐漸成形。

表 1：1955-1970 年至政大講學的客座教授

年分	學者	開設課程
1	1955 美國猶他州州立大學孔慕思 (Carlton Culmsee)	公共關係、大眾傳播、民意學
2	1957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朗豪華 (Howard R. Long)	公共關係、大眾傳播、民意學
3	1959 日本東京大學小野秀雄 (Hideo Ono)	日本新聞史、新聞學研究
4	1961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葛迺敦 (Charles C. Clayton)	新聞寫作、評論寫作、美國新聞學
5	1963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凱賽 (John Casey)	公共關係、廣告學、新聞寫作
6	1968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貝克 (Richard T. Baker)、 福斯特(John Foster)、 日本世論協會小山榮三	
7	1969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喻德基 (Frederick Yu The-Chi)	
8	1970 美國密蘇里大學梅里爾 (John C. Merrill)	

資料來源：《一步一腳印——政大新聞教育六十年大事紀》（頁 3-7），林元輝編，1995，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除了透過美日學者協助強化臺灣新聞傳播的知識生產，曾虛白（1990，頁 729-737）也在美國主流傳播研究領域中，逐漸建立其對於「民意」的理論基礎，聯繫上其三民主義中的「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論調，認為在政府與人民間應建立溝通管道，由先知先覺的領導，帶領不知不覺的群眾，創造正確的民意，而新聞工作者除了是位於中間發揮輔導作用者。曾虛白認此說法可在中國本土脈絡下，補充美

國民主體制與學術對此問題的不足，也為國民黨政府強化其控制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正當性。

在曾虛白主導下，臺灣從美方取得資源建構為亞洲的心戰重地，根據國家的需要，以反共和國家安定為主軸，運用「三覺論」的論述基調，建構新聞工作與宣傳的位置。1962 年政大新聞館落成時，是全校第一座系館（林元輝，1995，頁 70），且獲得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來電致賀，電文提及「貴校在蔣總統創設擘劃下，宏規早立，更因其在非共產世界推廣新聞教育居於領導地位而譽滿遠東……」（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69）。規格相當不同，也可見其特殊性和在美國文化冷戰中的重要性。

從新聞研究所創設後的前七年（1954-1960）來看，總計 67 名學生，來自不同省籍，其中以江蘇和浙江居多，約占三分之一，當中僅一名韓國外籍生，沒有「僑生」名列其中；學生的本科學科背景主要來自新聞系、經濟系與外文系（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1961，頁 9）。此時新聞研究所著重培養「配合國策及培養高級通才」，研究生幾乎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是維繫與鞏固國民黨政府核心的生力軍。至於來自其他地域的「僑生」，並非國民黨政府在研究所階段特別需要培養的對象，因此未因要招收「僑生」放寬入學標準。<sup>11</sup> 除顧及基本公平與研究所階段沒有美援補助「僑生」的誘因，似乎也顯示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建構國家機器與國族計畫裡，以及宣傳與心戰策略的知識生產工作上，出現「中國國族」之中「內外有別」的考量。此時「僑生」在「中

---

<sup>11</sup> 曾有一名獲夏威夷大學研究中心獎學金的馬來西亞「僑生」，畢業於政大新聞系（1958-1962），他從報紙得知時任僑務委員長的高信表示歡迎畢業僑生「返國」念研究所，因此去函僑委會詢問是否可免試入學政大新聞研究所。但僑委會回覆指出，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對海外「僑生」不能保送，需依一般規定逕行報考（外交部，1964 年 4 月 7 日-4 月 25 日，檔案編號：020-010605-0008）。

國」的召喚下，得以較寬鬆的入學條件「回國」接受大學教育與訓練，日後還是以返僑居地執行「國家」賦予的「任務」為主。然而在國家所需的研究所「高級通才」，「在地」的「中國人」似更具備資格，且更能獲得信任，其中也涉及地緣與人脈的複雜關係。

經政大新聞研究所訓練者也有更多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和機會，1950年代中期以後赴美留學的年輕研究者之中，大多是黨國的傳播媒體與教育機構所培育的新秀，他們較有機會取得相關單位的補助，到美國知名的新聞傳播研究所深造。1960年代初期，這批留美的年輕傳播研究者學成返國，更大量引介美國主流的大眾傳播學研究（林麗雲，2004，頁110-116）。

但這個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系統的建置未必是鐵板一塊，完全沒有縫隙，譬如邀請美國與日本學者來臺講學，就未必能完全掌控其言論。有學者以二戰期間從美國邀請的新聞工作者為例，指出美國在二戰時曾通過援華計畫幫助中華民國強化新聞專業，當時被派到中國的美國新聞專業人士都驚覺中國政府只把媒體當成是黨的喉舌，國民黨一直踐踏新聞自由，完全不尊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有些最後和國民黨政府不歡而散，因此質疑在1950年代政大「黨校」色彩甚濃之下，這些美國學者是否能和系所方合作愉快（黃庭康，2017，頁174）。部分赴美留學的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者，積累西方相對自由的生活與學術研究經驗，但在冷戰初期臺灣體制的限制下從事研究與教育工作，未必完全服膺政治體制與意識型態的約制，試圖以不同方式展現其能動性。

政大透過在大學部招收大量「僑生」，在復校初始階段獲取更多資源建設學校與系所，特別是在硬體建設上。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上美國方面在軟體與人員的援助，也讓新聞傳播研究得以更好的開展。且在整體研究與教育的分工上，這批受學術訓練能掌握更多理論的各省籍學

生，日後可以成為國民黨政府直接可任用的宣傳與建構新聞論述人員，被賦予更高階的工作任務，持續建立國家安全為基礎的整體理論，強化和宣揚國民黨政府在海內外的正當性。

表 2：政大新聞研究所研究生籍貫統計（1954-1960）

籍貫	江蘇	浙江	湖南	福建	山東	臺灣	江西	安徽	遼寧	湖北	河北	山西	廣西	廣東	河南	青島	北平	韓國	共計
人數	13	9	7	7	5	4	3	3	3	2	2	2	2	1	1	1	1	1	6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新聞年鑑》（頁 9），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61，臺北市：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伍、冷戰初期新聞系的任務與特點

冷戰初期臺灣正值國家生死存亡之間，在新聞傳播的知識生產與教育建制化過程中，部分奠基於反共復國與國家安全的論述，而大量「僑生」的存在，能強化「自由中國」的論調及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當性。從中也可取得美援的補助，有利於整體大學機制的開展，也更實際地將宣傳機制向臺灣以外延伸，與其他地區合作對抗共產力量的擴張。

### 一、復辦後新聞系的任務

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韓戰期間逐漸穩住陣腳後，1954 年 12 月與美國締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強化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反共圍堵戰略，也被蔣介石視為其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外交成就（Lin, 2016／黃中憲譯，2017，頁 30-31）。在內外情勢變化與發展下，國民黨政府從較消

極的「守勢」態度，改以更積極的對外與中共競爭，政大新聞系的開展，也顯示國民黨政府的一些轉變。在面臨中共力量可能「滲透」的風險下，亟需培養大量新聞與宣傳人才的國民黨政府，在政大新聞系招收逾半的「僑生」，其中許多來自左翼氛圍濃厚的東南亞地區華裔青年，試圖讓他們透過有系統的訓練和在「自由中國」下的生活，更有意識傳達「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

因此新聞系復辦後，除延續過往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的傳統，且有大批海外青年學生到「祖國」接受新聞教育，擴大「自由世界」到各地的宣傳種子，且能獲美援補助。因政大的特殊角色，使新聞系在臺復辦後，在學生人數、制度、課程和設備上，都肩負建設臺灣復國與建國需要的新使命（徐佳士，1982，頁 93）。

「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培養真誠純潔的青年，成為大公無私盡忠職守的記者。我們以追求真理與事實來建立公正的輿論，為服務社會而不斷努力，我們信仰三民主義，忠愛國家民族，並以促進自由世界的團結與了解為我們奮鬥的目標」（謝然之，1959）。擔任新聞系主任的謝然之，從他的黨政關係來看，其自 1937 年起後，便在陳誠麾下負責文宣工作，陳誠更為其證婚人，可說是陳誠人馬。而陳誠在擔任臺灣省主席後，在 1949 年任命其擔任《臺灣新生報》社長（至 1970 年），<sup>12</sup> 等同是將該報交由其親信手中，使其成為省府最重要的宣傳機關。然而，透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參與，謝然之也接觸了蔣經國，並在 1943 年與其首次會晤時，談及創辦中央青年幹校的問題。1950 年總政治部主任蔣經

---

<sup>12</sup> 在謝然之任《臺灣新生報》社長期間，其在大陸時期的政大新聞系與臺灣政大復辦後的多名學生，成為《臺灣新生報》的中堅幹部。謝然之身兼臺北政工幹校新聞組主任，1950 年代《臺灣新生報》也成為該校實習的報社之一，許多學生畢業後先後進入該報任職（楊秀菁，2016，頁 64）。

國指示其成立政工幹校新聞組（謝然之，2000，頁 161、165）。在謝然之結束新聞系主任職務後，曾任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1961-1967），顯見國民黨多位領導人對其的信任程度。

但謝然之在接下新聞系主任時，因無力兼顧系務，聘請新聞研究所畢業的李瞻、陳諤和張宗棟為講師，協助日常教務和學生實習刊物（謝然之，2000，頁 168）。1957 年再聘任自美返臺的王洪鈞任教和協助系務；1960 年謝然之辭系主任，由王洪鈞接任。在新聞系草創時期，謝然之未必有很大心力涉入，但透過可信任的學生輩協助系務，謝然之看起來較類似監督者的角色，且謝然之在 1960 年代也是國民黨媒體「社會責任論」的主要推動者（楊秀菁，2014），強調國家利益高於新聞自由等理念。

在實習出版物部分，1958 年創辦校內發行的英文刊物《政治前鋒》（The Chengchi Vanguard），由臺北美國新聞處贊助（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1959），創刊時期也由臺北美國新聞處官員指導和協助，且運用美新處資源上課和執行編務（李敦嶠，2004，頁 5、22）。可見美國新聞處與政大新聞系的密切關係，不迴避直接投入資源和人員，協助復辦的政大新聞系，建立更親近美國意識形態的新聞傳播教育機制，使臺灣成為美方在亞洲華人地區宣傳中心。這背後涉及美方在亞洲的整體戰略與利益考量，而國民黨政府也非常樂於接收這些資源和與美方合作。

1960 年政大新聞系也和管制媒體的國民黨第四組合作進行研究工作，主要是選擇比較各報紙在重大新聞中的作風，以及剖析其可能的影響，相關研究成果多由國民黨第四組出版，再分送各界參考（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71）。國民黨透過與政大新聞系的合作，試圖以學術研究作為媒體的實務規範，也與其所強調的社會責任論有所結合。政大新聞系強調「大量新聞教育」，為推翻中共政權後，國家重建準備足夠

的人才，且力行三民主義，其中包括人數眾多的「僑生」。因此，新聞系在教育工作上，有「大量教育」和「僑生」教育兩大目標（同上引）。

在大學部的部分，其考量與規劃和研究所不太一樣，也有不一樣的分工，更著重實務人力的培養，其中「僑生」人數約占一半，<sup>13</sup> 也將「中國」的定義擴大，含括了其他地區的「華僑」，特別是美國所重視的東南亞地區，持續對臺灣內部與外部建構建國及復國論述。在中央政校時期，新聞系教育的一項特色是培養國際宣傳人才，在臺復系後，透過來自海外其他地區的大量「僑生」，更擴大在國際的宣傳工作，「為復國建國而努力」（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62）。

---

<sup>13</sup> 除新聞系外，本文未取得復校時期的其餘四系之「僑生」數據，無法進一步析論和新聞系的差別。但以民國 60 年（1971 年）政大的在學人數來看，新聞系學生人數為 263 人，其中 126 名為「僑生」，約占 48%；教育系學生人數為 251 人，其中「僑生」人數為 67 人，約占 27%；外交系學生人數為 229 人，其中「僑生」人數為 53 人，約占 23%；政治系學生人數為 161 人，其中「僑生」人數為 19 人，約占 12%；民族社會系（原為邊政系，1969 年更名）學生人數為 125 人，其中「僑生」人數為 3 人，約占 2%（國立政治大學，1972，頁 98-99）。當中可看到各系「僑生」比率的差別，此時新聞系的「僑生」比率仍約占一半，比其他科系仍相對較高。另外，國民黨政府為了改善整體的經濟狀況，拓展對外的國際貿易，政大在 1957 年設立國際經營與貿易系，「僑生」比例也相當高，1971 年該系學生總人數為 238 名，其中「僑生」人數為 78 名，占學生人數的 33%。至於 1960 年代後，因應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美國也透過各種管道給予合作支持，1962 年政大與美國密西根大學簽訂合作計畫設立的企業管理系，1971 年學生總人數為 454 名，其中「僑生」有 112 名，占學生人數的 25%（同上引）。以上各科系的「僑生」人數中，新聞系的「僑生」比率相對突出，也可見國民黨政府在此政策上的延續性，未因美援補助「僑生」經費的停止而大幅減少新聞系的「僑生」人數。直到 1988 年以後，新聞系的「僑生」比率才大幅下降（馮建三，2005，頁 356-357）。

表 3：政大新聞系註冊人數與「僑生」人數（1955-1960）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註冊總數	45	60	75	47	73	99
僑生人數	24	21	36	25	40	68

資料來源：《自反縮不縮？新聞系七十年》（頁 356），馮建三編，2005，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但是對於招收眾多「僑生」，也引發實務界的不同意見。在 1961 年 5 月由政大召開的教育座談中，中央社前社長蕭同茲認為新聞教育要有完整的體制和一套完整的課程（王洪鈞，1993，頁 168）。他甚至不主張因為政策性的需要，或爭取美援而接受來自各地「僑生」，因學生語言和水準有落差，會影響新聞教育的素質。而編輯人協會也建議政大新聞系學生人數必須加以限制，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姚淇清不表贊同，強調「吸引『僑生』是國家的政策」（王洪鈞，1993，頁 168-169）。實務界的這類意見在官僚舉起「國家」之名下，難以改變和鬆動政府的決策，讓系務推展面臨兩難情境，也顯示在掌權者的戰略與政策方向下，行政官僚在當時情境下也不易違背上級指令，但實務界未必認同。

來自各地、人數眾多的「僑生」，在學習上會面對各種問題，譬如中、英程度不一，大學校方也了解其中的教學等問題（王洪鈞，1993；馬星野、王洪鈞，1967）。但在國家的大方向下，僅能在自身有限的的能力範圍下進行調整，而政大新聞系中大量「僑生」的存在，涉及未來式的「反攻大陸」後之復國與建國準備工作。這樣的政策和論述強化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對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展示「國家」與「民族」在特殊時空環境的神聖角色與位置，培植與鞏固在廣大華人社會的反共力量 and 聲勢。

以 1956 年從婆羅洲砂拉越（Sarawak）到政大新聞系就讀的李敦嶠為例，家庭背景與個人學習經驗中，讓他在政治與文化上傾向中華民國。但是在當時左翼氛圍濃厚的東南亞，李敦嶠從婆羅洲詩巫（Sibu）搭船前往新加坡辦赴臺簽證時小心翼翼，不敢張揚去臺灣念書一事，以免惹不必要的麻煩（李敦嶠，2004，頁 541-542）。李敦嶠念大二時，被國民黨第三組陳姓副主任召見，<sup>14</sup> 要求他入黨，但為李敦嶠所婉拒，不過他願意以黨外人身分為國為民服務，尤其是「反共抗俄」事務。李敦嶠在大一暑假時，曾奉命以美援經費回到砂拉越率領青年赴臺深造；大二暑假時，也獲津貼返回砂拉越，透過各種活動吸引更多學生赴臺升學，且帶著僑委會特別允許攜帶以蔣介石署名的《蘇俄在中國》十餘冊，以及新聞處出品的《國軍紫宸演習》出境，分訪砂拉越多個鄉鎮的高中，公開說明在臺灣讀書的情況（同上引，頁 357-359）。對原本傾向國民黨政府的學生，抵臺升學後持續認同黨政的理念，在獲得外援下，願意返鄉積極宣揚臺灣的高教政策，這在當時左翼氛圍濃厚的地區並不常見，也強化國民黨政府的正當性。

1960 年 7 月李敦嶠自政大新聞系畢業回到砂拉越後，陸續為英殖民砂拉越新聞處和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美新處，USIS）駐古晉（Kuching）分處服務，展開其在東南亞的情報工作。直到 1970 年代冷戰環境變化和美國政府削減開支，古晉和檳城美新處遭裁撤，吉隆坡美新處總部也裁減人員，此後李敦嶠才轉向商界發

---

<sup>14</sup> 此人應為陳元，1955-1957 年任第三組副主任，曾是蔣經國在三青團的學生。國民黨在 1956 年中常會決議，由第三組會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對於要返回居住地的「僑生」，運用寒暑假進行集中訓練，施以反共的政治教育（陳鈺馥，2018 年 6 月 10 日）。1956 年 2 月後國民黨中央也曾派陳元等人赴新加坡整頓黨報《中興日報》，但終究無力改變其命運，《中興日報》在 1957 年底關閉（黃辰濤，2009，頁 97-98）。

展（李敦嶠，2004）。不過「僑生」的背景複雜多樣，各地情勢也不同，李敦嶠的實踐僅是其中一類，並非政大新聞系「僑生」都有清晰的「反共」意識和行動，相關狀況非本文所能處理。

## 二、師大與私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的角色

1955 年政大恢復新聞系大學部，師大同年也開設社教系，從第二學年開始實行分組，有新聞組、圖書館組和社會事業組。其中新聞組的角色和政大新聞系作了一些分工，但兩系關係頗為密切，任課老師也是兩校互通。社教系新聞組是「訓練社教專才，以大眾傳播為社教的媒介，達成改造社會的任務」，不過學生人數不多，至 1961 年的三屆畢業生共 45 人（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1961，頁 32）。

上文曾述及為拉攏與聯繫海外華人，僑委會在 1955 年 9 月於臺北召開「華僑文教會議」中提出「發展華僑社會教育方案」，要求在新聞人才缺乏的地區，建議政府設置獎學金，鼓勵該區「僑生」修習新聞學系，同時建議政大開辦新聞學專修班，招收有志從事新聞事業的華僑青年，透過一年或兩年的訓練及實習後，居住地擔任新聞工作（鄭彥棻，1955，頁 84-85）。同時，臺灣民間也有言論呼籲政府和新聞業協助各地華文報紙，對抗中共的積極進逼（元建，1955，頁 80-82）。

與中共競爭積極爭取外在華人社會支持的國民黨政府，面對外在的實際需求，必須予以回應，也希望能擴大在海外的宣傳成效和「民意」。但是從黨政高層設定的任務分配與設定來看，政大新聞系主要是培養黨政需求下，經正規訓練的新聞傳播人力，若欲要求政大開設較具彈性與權宜性質的新聞班，僑委會和教育部這一層級未必有能力快速達成此任務。因此隸屬於教育部的師大，成為行政體系較可能調動的資

源，既可回應海外華人社會的需求，也可強化僑委會在這些地區的宣傳效力。

因此，師大成為行政緩衝的機制之一，減少對政大推動新聞傳播教育與知識生產的干擾，讓國民黨政府得以快速回應外在需求。1956年8月改在師大增設華僑新聞教育專修班；1956年10月開辦華僑新聞專修班，由海外各僑報保送新聞人員回國深造（鄭彥棻，1957，頁23）。

華僑新聞專修班首屆收生人數為40名（外交部，1957年11月28日-1959年06月11日，檔案編號：020-049910-0063），1957年和1958年分別收生16人與13人，學生主要來自東南亞的越南和星馬（彭震球，1958，頁54）。學員在師大研究社會學和新聞學，且有旅行參觀行程，更了解臺灣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被期待一年後返鄉能更多正面宣傳「自由中國」的進步。然而，至1959年參加新聞記者訓練班者共有39人（國立教育資料館，1959，頁60；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58，頁171），效果不是很好，後來也無以為繼。

在私立高等教育部分，1952年時任立法委員的成舍我本想在臺復辦《世界日報》，但因國民黨政府實施戒嚴與「報禁」，未能獲准。1953年4月18日他在《新生報》發表〈需要一萬名新聞幹部回大陸〉（成舍我，1953年4月18日），強調培養新聞人才的重要，經一些時日後獲准辦校。成舍我原想辦專科或本科，但因當時政府對大專設立管制嚴格，只能先辦職業學校（成嘉玲，1998）。國民黨政府對民間興辦高校限制頗多，對新聞教育抱持謹慎態度，但也需安撫內部的壓力，攏絡民間人士。

「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在1956年獲准興辦，成舍我在呈請立案的創校旨趣中指出：「本校創立，其目的在培養『德志兼修，手腦並用』之健全新聞人才，供自由中國及反攻大陸後，建立新聞自由及健全新聞

事業之用，以為實現健全民主政治之基礎」（成舍我，1974 年 10 月 15 日）。因此，世界新聞職業學校的辦校旨趣雖服膺國民黨政府「自由中國」與復國主調，但仍強調新聞自由與健全新聞事業。

1962 年曾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隔年成立新聞系，邀請謝然之擔任系主任，但謝然之仍任《臺灣新生報》社長，乃商請政大新研所畢業的鄭貞銘代理系務（謝然之，2000，頁 71）。此時私校新聞傳播科系在招收學生部分，主要是本土學生為主。冷戰初期在國民黨政府的「反攻復國」口號與管制下，各個新聞傳播教育科系也以政大新聞系設置的框架下展開。1965 年教育部修訂各學系必修科目，在新聞系部分即以政大課程修訂案為藍本（王洪鈞，1993，頁 188）。

整體而言，在冷戰初期連動的亞洲地緣政治脈絡中，臺灣的新聞傳播學術與教育得以逐漸建制化，而新聞傳播學術的掌舵者以國家的首要目標（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下從事反攻復國與建國）為基礎，建立規範性的新聞理論與大敘事歷史。當國民黨政府要出手管制媒體時，傳播學術生產場域的成員就協助擘畫新聞管制政策，且把官方新聞管制的邏輯翻譯成學術語言，建構規範性的新聞學理論，以正當化國民黨政府的新聞管制，強調媒體有社會責任引導「正確的」民意（林麗雲，2004，頁 80-94）。來自其他地域的華裔學生在接受相關教育後也受到各種影響，返回居住地後各自發揮自身所學，持續進行著未必被看見的工作，在過往臺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的建構敘事中多被隱身忽視。

## 陸、結論

冷戰初期美國全面介入亞洲地區，但不斷調整其策略，以更有效地

抑制共產力量的擴散。在戰時狀態下，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和美國政府的互動，雖有政治現實考量，以爭取美方支持，但也不是完全順從的角色。國民黨政府順應時勢變化爭取實質的資源，扮演「自由世界」在亞洲的角色，也藉此機會開展在臺灣的建設和鞏固政權。其間涉及的不僅是美國政府、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大陸的中共政府，還有冷戰初期亞洲等地的政經情勢變化與社會需求，以及「國家」內部各種權力的競爭與合作，產生複雜的連動關係，也影響了此時的臺灣高教開展。

1954年後蔣介石因應內外的各種壓力和情勢變化，在亞洲地緣政治中順勢接收更多美援，在臺灣強化大學教育發展和建立宣傳機制，以強化內部治理與外部宣傳，成為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建構國家機器與國族的一部分。此時國民黨政府招收大量東南亞「僑生」，減少東南亞華裔青年為共產勢力影響，以此取得美援的支持，再以這些資源培養「國家」發展所需的各類人力，以及增強對大學體制的控制力，也強化國民黨政府對內外有關治理「自由中國」的正當性，建構「自由世界」之窗在亞洲的角色，試圖削弱中共在華人地區的召喚力道。

前身為「黨校」的政大在臺復辦與其新聞系招收近半的「僑生」，成為當時相當特殊的大學與科系，而臺灣的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也以政大新聞系所為重心開展。除了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的治理需求，當中也考量美國與亞洲非共國家的反共策略與布局，且涉及各國對在地華人的政策回應和治理，因此並非僅是臺美之間的治理和策略需求。政大新聞系從招收大量「僑生」政策獲取更多美援，協助系所軟硬體的建設。一方面有助新聞研究所的開展，建構知識生產的基礎；另一方面透過新聞系大量培育「僑居地」新聞人才，加強國民黨政府在其他華人地區宣揚「自由世界」的意識，同時透過美國各基金會等組織的援助，引

進美國的軟體與人員協助構建研究及教育機制。

政大新聞系所在臺復辦初期的主事者與黨政關係緊密，還需符合國家安全與「反攻復國」的特殊現實需求，難以挑戰以「國家」之名舞動權力的領導人權威。但是在「國家」內部的利益分配與競爭等因素，連動影響領導人在政策上的推動，「國家」也未必能完全壓制些許異議聲音與行動者的能動性。整體而言，國民黨政府重整宣傳指揮體系和取得更多美援下，在華人地區試圖建立「自由世界」之窗的形象，在相當程度上形塑冷戰初期的臺灣新聞傳播知識生產與教育機制初步基礎，不過對此後臺灣以外地區華人社會在新聞傳播發展的影響，尚待進一步釐清和探索。

## 參考書目

- 王洪鈞（1993）。《我篤信新聞教育》。臺北市：正中。
-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7-55。
- 王梅香（2020）。〈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32(1): 123-158。
- 元建（1955）。〈現階段的華僑報業〉，《報學》，8: 80-82。
-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61）。《中華民國新聞年鑑》。臺北市：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外交部（1953年1月28日-1956年1月5日）。《星馬華僑籌辦南洋大學》（檔案編號：020-010505-0005）。臺北市：國史館藏。
- 外交部（1955年4月5日-1957年12月5日）。〈回國升學僑生（民國四十至四十五年）〉，《僑生回國升學（二）》（檔案編號：020-049910-0062）。臺北市：國史館藏。
- 外交部（1957年3月30日）。〈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周海通宣傳小組案》（檔案編號：A303000000B/0044/818.11/0005）。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外交部（1957年11月28日-1959年6月11日）。〈華僑新聞教育專修科學生保送須知〉，《僑生回國升學（三）》（檔案編號：020-049910-0063）。臺北市：國史館藏。
- 外交部（1964年4月7日）。〈為馬來西亞僑生蔡士文申請免試入政大新聞研究所由〉，《馬來西亞學生申請來臺留學》（檔案編號：020-010605-0008）。臺北市：國史館藏。
- 外交部（1964年4月25日）。〈關於馬來西亞僑生蔡士文請保送入政大新聞研究所事復請轉知由〉，《馬來西亞學生申請來臺留學》（檔案編號：020-010605-0008）。臺北市：國史館藏。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1966a）。《僑生教育計畫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市：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1966b）。《臺灣大學歷年來接受美援運用成果檢討》。臺北市：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1966c）。《師範大學歷年來接受美援運用成果檢討》。臺北市：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1966d）。《成功大學歷年來接受美援運用成果檢討》。臺北市：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 成舍我（1953年4月18日）。〈需要一萬名新聞幹部回大陸〉，《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取自 <http://csw.shu.edu.tw/File/Download/DigitalArchives/2-2%E9%9C%80%E8%A6%81%E4%B8%80%E8%90%AC%E5%90%8D%E6%96%B0%E8%81%9E%E5%B9%B9%E9%83%A8%E5%9B%9E%E5%A4%A7%E9%99%B8.pdf>
- 成舍我（1974年10月15日）。〈我如何創辦世新（十八周年校慶）〉，《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取自 <http://csw.shu.edu.tw/Article/ArticleCollectionDetail/774>
- 成嘉玲（1998）。〈「世新」永遠的老校長：父親在新聞教育上的理念與貢獻〉，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164-173。北京市：新華。
- 任育德（2009）。〈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 221-262。
- 安後暉（2010）。《美援與臺灣的職業教育（1950-1965）》。臺北市：國史館。
- 沈錡（2000）。《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一冊）。臺北市：聯經。
- 李敦嶠（2004）。《征戰時運有迷悟：首位砂勞越留臺生半世紀沐恩旅程》（出版項未刊稿）。
- 利亮時（2012）。《陳六使與南洋大學》。新加坡：八方。
- 何介富（1975）。《行政院輔導僑生回國升學政策之研究》。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元輝編（1995）。《一步一腳印——政大新聞教育六十年大事紀》。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林孝庭（2015）。《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 1949-1988》。臺北市：聯經。
- 林果顯（2014）。〈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館刊》，39: 117-157。
- 林果顯（2015）。〈戰爭思惟下的戰後臺灣新聞管制政策（1949-1960）〉，《輔仁歷史學報》，35: 239-283。
- 林麗雲（2004）。《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臺北市：巨流。
- 馬星野、王洪鈞（1967）。〈本校新聞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政大四十年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政大四十年》，頁 61-74。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 徐佳士（1982）。〈政大新聞教育的創始成長和現狀〉，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編《新聞教育與我》，頁 87-99。臺北市：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 張其昀（1958）。〈最近四年之華僑教育〉，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編《僑生之友》，頁 1-2。臺北市：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
- 陳百齡（2019）。〈報業政治獵巫：1950-80 年代《臺灣新生報》政治案件〉，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管理組編《未完結的戰爭：戰後東亞人權問題》，頁 51-101。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 陳鈺馥（2018 年 6 月 10 日）。〈黨產會：國民黨只是救國團 對僑生進行政治教育〉，《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453358>
- 陶晉生（2014）。《陶希聖日記 1947-1956》（下）。臺北市：聯經。
-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國立政治大學編（1972）。《國立政治大學概況》。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編（1959）。《政治大學的新聞教育》。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1957）。《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 1953-1957》。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1959）。《七年來的中美教育合作》。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 張淑雅（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市：讀書共和國。
- 程宗明（1999）。〈析論臺灣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1949-1980）與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林靜伶編《1998 中華傳播學會論文選集》，頁 385-439。臺北市：中華傳播學會。

冷戰初期建構華人「自由世界」之窗——臺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建制化（1954-1965）

- 馮建三編（2005）。《自反縮不縮？新聞系七十年》。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 曾虛白（1990）。《曾虛白自傳》（中）。臺北市：聯經。
- 彭震球（1958）。〈我們的新聞教育專修科〉，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編《僑生之友》，頁 53-54。臺北市：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
- 黃金麟（2017）。〈戰爭與臺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臺灣社會學》，34: 123-167。
- 黃辰濤（2009）。《爭取海外力量：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作（1945-1957）》。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中憲譯（2017）。《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臺北市：遠足文化。（原書 Lin, H.-T. [2016]. *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黃庭康（2016）。〈反思臺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頁 83-116。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黃庭康（2017）。〈評〈戰爭與臺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臺灣社會學》，34: 169-175。
- 楊秀菁（2012）。〈新聞自由論述在臺灣（1945-1987）〉。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楊秀菁（2014）。〈戒嚴時期傳媒「社會責任論」的引進與演變〉，《思與言》，52(2): 241-297。
- 楊秀菁（2016）。〈戰後初期《臺灣新生報》的發展與挑戰（1945-1972）〉，《傳播研究與實踐》，6(2): 55-85。
- 楊進發（2008）。〈創建南大二、三事〉，洪國平編《南洋大學第十屆全球校友會紀念特刊（2006）》，頁 10-12。墨爾本市：第十屆南洋大學全球校友聯歡會籌委會。
- 趙綺娜（1997）。〈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歐美研究》，27(2): 59-108。
- 趙綺娜（2001）。〈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 至 1970）〉，《歐美研究》，31(1): 79-127。
- 鄭彥棻（1955）。《華僑文教工作的方針與任務》。臺北市：海外。
- 鄭彥棻（1957）。《當前僑務：講述綱要》。臺北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
- 臺北市編輯人協會第四屆理監事會（1956）。〈會務報告〉，《報學》，1(4): 156-157。
-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編（1958）。《師大概況》。臺北市：臺灣省立師範大學。
- 謝然之（1959）。〈前言〉，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編《政治大學的新聞教育》。臺

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謝然之（1963）。《新聞學論叢》。臺北市：改造。

謝然之（2000）。〈自述年譜簡編〉，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新聞與教育生涯：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頁 151-193。臺北市：東大。

Kuhn, P. A.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SG: NUS Press.

Simpson, C (1994).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pening the Window to the “Free Worl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1954-1965)

Kock-Hoo Wong\*

## ABSTRACT

When the Kuomintang (KMT) retreated to Taiwan from mainland China in 1949, the situation was unstable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However, between 1950 and 1965, apart from three existing universities undergoing renaming and restructure, the number of tertiary institutions increased rapidly as nearly 20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were established. After such an intense wartime, what needs and conditions drove the Kuomintang to develop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especiall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mechanism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rior studies focus mainly on how media and academia were employed to serve the propaganda of “retaking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authoritarian rule of the Kuomintang. Others target on how the U.S. government actively mobilized such mechanisms to assert academic influence and to profess its ideolog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These studies mainly adopt the perspectives of Taiwan’s authoritarian rule and subordination to the U.S. By surveying teaching resources, curriculum, and background of key personnel, they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mechanisms and criticize its early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

\* Kock-Hoo Wong, Individual Researcher. E-mail: kockhoo@gmail.com.

One of the missing aspects is that these studies did not fully consider the complex and rapid changes in Taiwan and the Asian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Different interregional forces competed and collided, including potential disputes within the “state” apparatus, challenges to Chiang Kai-shek’s leadership from “third forces”, the intention of the U.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and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aspiration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se factors from the U.S., Taiwan, China, and Asia (especially Chinese communities) intertwined to influence the U.S.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Kuomintang’s policy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example, to understan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and its recruitment of a high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imultaneously examine the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S. aid policie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olicies, the Kuomintang’s propaganda strategies, etc. The complex context was not necessarily a result of top-down decisions, but of multifold power play and accidental factors that created a ripple effe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 By surveying various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geopolitical linkages among Asian countries and to re-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S., out of anti-Communist strategic needs in the early Cold War, in establishing Taiw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chanism, as well as its lasting influence on Taiwan and Asia.

In respons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Chiang Kai-shek in the early 1950s took advantage of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Asia and received more U.S. aid to enhance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propaganda mechanisms in Taiwa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legitimacy as “Free China” and propagate the idea of liberal democracy, the Taiwan government gained control over the universities by recruiting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ormerly a party school, was subsequently re-established, and nearly half of its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were overseas Chinese, making it a unique example. The Graduate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 NCCU became the kerne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part from serving the needs of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MT government, this was also a strategic and tactical move for the U.S. and Asian countries to counter Communism, as well as a political and policy response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their Chinese population. Voices of dissent were suppressed under the impact of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 within the country. With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ropaganda system and more U.S. aid, the KMT regime tried to build its image as the window to the “Free World” in Asia and in part shap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Keywords:** Cold Wa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 NCCU, Free China,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U.S. aid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五三期 2022 年 10 月